

城市偏向理论研究述评

□王颂吉 白永秀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城市偏向是指政府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实施的一系列偏向于发展城市部门的政策, 城市偏向理论则是学术界对城市偏向政策的理论反思, 该理论旨在倡导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本文系统评述了城市偏向理论的提出背景、研究过程及其争论, 并回顾了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城市偏向问题的研究成果。城市偏向理论是在反思城市—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过程中而提出的, 它为分析第三世界的城乡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效框架, 并且引发了大量相关研究与争论。城市偏向理论第一阶段的核心论题是发展中国家的价格扭曲, 第二阶段的核心论题是公共服务领域城市偏向的恶化。本文认为, 对于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偏向问题的延续与固化, 学术界仍需进行更多深入研究。

关键词: 城市偏向理论; 城市—工业化发展模式; 利益集团; 价格扭曲; 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 F2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56(2013)07—0095—08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新独立的亚非拉被殖民国家为迅速实现经济独立和国家富强, 大都选择了城市—工业化发展模式 (Urban - industrial Developmentalism), 力图通过优先发展城市工业部门来带动整体经济增长。但城市—工业化发展模式收效甚微, 并且损害了农村部门的发展。在反思城市—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过程中, Lipton (1977)^[1] 提出了城市偏向理论 (Urban Bias Thesis), 该理论为分析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偏向提供了一个有效框架, 从而引发了学术界对这一理论的浓厚兴趣。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价格扭曲 (Price Twists) 是城市偏向理论的核心论题。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 发展中国家的价格扭曲随着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而趋于弱化, 但由于城市阶层持续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第三世界国家公共服务领域的城市偏向有增无减, 学术界转向对公共服务领域城市偏向的研究。城市偏向理论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争论, 很多学术问题至今仍在探讨之中。Corbridge & Jones (2005)^[2] 曾对学术界关于城市偏向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过评述, 但这份综述没有深入探讨城市偏向理论演进的内在机理, 也未将中国的城市偏向问题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鉴于此, 本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对城市偏向理论的提出背景、研究过程及其争论作了进一步梳理, 并且评述了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城市偏向问题的研究成果。本文接下来的研究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研究城市偏向理论的提出背景; 第二部分评述城市偏向理论第一阶段的研究与争论; 第三部分评述城市偏向理论第二阶段的研究与争论; 第四部分为总结性评论。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部地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战略研究” (08&ZD027)

一、城市偏向理论的提出背景

城市偏向理论是在反思发展中国家城市—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产生的。发展经济学和区位理论家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城市—工业化发展模式提供了理论指导。20世纪50、6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大都通过政府干预,实施了以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为标志的城市—工业化发展模式。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不仅普遍高估本国货币,使用诸如关税和进口配额等贸易保护措施,而且以政府营销机构垄断工农业产品交易,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手段汲取农业剩余以支持城市工业部门发展。总体而言,尽管第三世界国家为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付出了巨大代价,但该战略却收效甚微。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导致经济活力与效率不足,并且产生了大范围的寻租活动,受保护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也未能形成国际竞争力,从而造成了政府对没有效率的企业保护,产生了“政府失灵”。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工业化发展模式造成了城乡关系扭曲、城乡差距扩大等一系列问题。与此相对应,东亚地区“农业需求引导的工业化模式”(Agricultural – demand – led – industrialisation)则取得了很大成功。鉴于此,城市—工业化发展模式引起了经济学界的理论反思。

经济学界对城市—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理论反思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一大批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重新评价农业在引导整个经济增长中的角色与作用。Schultz(1964)^[3]认为,通过改造传统农业,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都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Ranis & Fei(1961)^[4]在对东亚发展经验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Lewis的城乡两部门模型存在两个缺陷:一是没有足够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二是没有注意到农业部门由于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的先决条件。鉴于此,他们认为应注重工农业部门之间的均衡发展,并对Lewis模型进行了修正,形成了Lewis – Fei – Ranis模型。另一方面,一批经济学家对第三世界偏向发展城市而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Hoselitz(1957)^[5]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存在“过度城市化”(over – urbanizing)现象,即与发达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情形相比,当代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就业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偏小,并且农村发展严重滞后。这一论点随后得到Berry & Sabot(1984)^[6]等研究的支持。总体而言,上述研究指出了第三世界国家偏向于发展城市工业部门所导致的问题,这推动着理论工作者重新认识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

二、城市偏向理论第一阶段的研究与争论

在对城市—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反思过程中,Lipton提出了城市偏向理论。该理论甫一提出,就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研究与激烈争论。在第一阶段,城市偏向理论的核心论题是发展中国家的价格扭曲。

(一) 城市偏向理论的提出及主要论点

1947年独立之后,印度实行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经济体制,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并在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56—1966年)优先发展重工业,力图迅速实现以重工业为先导的工业化。这一时期,印度通过价格剪刀差等手段从农村以低成本提取农业剩余,损害了农业部门的发展。1968年,Michael Lipton在对印度进行系统调查的基础上,首次从城市偏向的视角论述了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7]。此后,Lipton于1977年出版了《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 A Study of Urban Bias in World Development》一书,系统提出了城市偏向理论。Lipton(1977)^[1]指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尽管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小,但由于城市阶层的组织性、游说能力和政治影响力远高于农村阶

层,加之主流发展理论支持城市—工业化发展模式,政府由此实行了一系列偏向于城市发展的投资、税收、价格以及其它政策,导致城市地区分享了很大份额的资源,造成了城乡关系的扭曲和农民生活的困境。

在第一阶段,城市偏向理论的核心论题是发展中国家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扭曲。这一阶段城市偏向理论主要有以下六个论点:其一,从公平角度来看,农村地区拥有绝大部分贫困人口,因而应实行由城市到农村的再分配;其二,从效率角度来看,农村拥有绝大部分能推动经济增长的低成本生产要素,因而应将农村作为重要投资场所;其三,由于城市阶层拥有绝大部分组织能力、游说活动和政治影响力,使得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城市偏向政策;其四,农村地区获得的教育和卫生等公共资源非常少,使得农村精英纷纷向城市迁移,城市阶层与农村阶层的利益冲突已成为当代第三世界的主要矛盾;其五,相对于收入水平相似的城市居民,以及政府对农村地区的公共投资而言,农民被迫承担了不合理的双重税,并且受到价格扭曲政策的剥削;其六,城市偏向的资源分配与价格扭曲政策不公平且无效率,非农部门的投入产出比^①(the Investment-to-output Ratio)是农业部门的两倍,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社会总产出水平。

(二) 城市偏向理论第一阶段的相关研究

城市偏向理论对分析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效框架,这引发了学术界对这一理论的广泛兴趣。此后,一大批学者围绕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偏向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关于城市偏向形成机制的研究。Lipton(1977)^[11]认为,发展中国家产生城市偏向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政治结构,即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居民在谈判地位和政治影响力上严重不对等。美国政治学家 Bates(1981)^[18]通过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研究,支持了 Lipton 关于城市偏向形成机制的分析。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小农由于居住分散和治理结构贫乏而难以被组织起来,其政治影响力极为有限。相比较而言,城市居民和富裕农民则形成了利益集团,政府作为这一利益集团的代理人,倾向于保护城市居民和农村精英的利益。Gugler(1982)^[19]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尤其是作为首位城市的首府)是权力与特权的中心(Centers of Power and Privilege),城市精英将过多份额的资源集中到大城市,导致发展中国家首位城市的规模不断膨胀。Amartya Sen(1981,中译本 2001)^[110]则从权利视角论述了饥荒中粮食分配的城市偏向,他强调非民主体制下不同阶层对粮食的支配能力存在显著差别,进而将饥荒看作农民阶层权利失败的表现。此外,Varshney(1993)^[111]认为,民主制度对于限制印度的城市偏向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二,关于发展中国家价格扭曲问题的研究。价格扭曲是城市偏向理论第一阶段的核心论题。Bates(1981)^[18]通过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体系的研究,认为该地区产生粮食危机和政局动荡的根本原因,不是由于气候变化和沙漠化等自然原因,而是由于专制政府对小农阶层实行的价格扭曲政策。此外,Ellis(1982)^[121]研究了坦桑尼亚 1969—1980 年间的农业价格政策及其影响,指出坦桑尼亚通过政府垄断的营销局(Marketing Boards)从农民手中低价收购经济作物,然后将其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出口到海外,以此汲取大量农业剩余支持城市工业部门发展,这对于农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经济增长都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为支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也通过价格扭曲等政策汲取了大量农业剩余。冯海发、李澍(1993)^[13]通过测算指出,1952—1990 年间,中国政府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汲取了

^①“投入产出比”是一种经济效率评价指标,其含义可以理解为“项目投入资金与产出价值之比”,比值越小,表示经济效益越好。

8708 亿元资金;如果把农业税收、农村储蓄净流出等形式也计算在内,那么这一数值高达 11594 亿元。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价格扭曲政策严重损害了农业部门的发展环境,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三) 城市偏向理论第一阶段的争论

城市偏向理论与这一时期的主流经济思想格格不入,从而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争论。在第一阶段的论争中,城市偏向理论主要遭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批评:一是认为城市偏向理论所使用的测度方法不恰当;二是认为城市偏向理论缺乏相关证据支持;三是认为城市偏向理论对于城市阶层和农村阶层的外延界定不清晰;四是认为如果占主导地位的阶层在优先发展城市的过程中损害了公平与效率,那么可能存在一种补偿机制。对此,在题为《Urban Bias Revisited》(1984)^[14]的文章中,Lipton 对这些批评意见进行了回应。

此外,一些研究认为城市偏向理论对城市偏向形成机制的分析有失偏颇。Lipton(1977)、Bates(1981)认为,发展中国家产生城市偏向的主要原因在于城乡居民的谈判地位与政治影响力严重不对称,针对这一观点,Corbridge(1982)^[15]认为,尽管城市阶层与农村阶层的确存在各自独立的政治利益,但城市偏向产生的根源并非城市阶层的政治压力,而是由于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不利于农村发展的政策。Wegren(2002)^[16]对原苏联国家的城市偏向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在苏联解体之后,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并没有弱化这一地区的城市偏向,与此相反,城市偏向反而成为进一步推进民主化的障碍。这类观点得到中国学者的支持。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存在着严重的城市偏向问题,但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实行城市偏向政策的原因并非城市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而是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经济战略的必然结果^{[17][18]}。

三、城市偏向理论第二阶段的研究与争论

随着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发展中国家的价格扭曲不断弱化,但公共服务领域的城市偏向却有增无减。这一阶段,学术界对发展中国家公共服务领域的城市偏向进行了考察,城市偏向理论在该时期也引起了更大范围的争论。

(一) 公共服务领域城市偏向的相关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初,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持续的国际收支困难和债务危机之中,被迫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在此过程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调整”作为向其提供贷款的先决条件,这被称为“结构调整政策”^①。结构调整政策是与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相对应的理论范式,其实质是放松甚至取消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

在与 Eastwood 合作的一篇论文中,Lipton 认同结构调整政策弱化了发展中国家的价格扭曲,也赞同这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贫困减除。但他同时指出,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由于城市阶层依旧对公共政策具有强大影响力,使得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支出仍然向城市部门倾斜,这导致发展中国家公共服务领域的城市偏向不断上升,并且价格扭曲的弱化并没有对公共服务领域城市偏向的上升产生多少抵消效应。因此,发展中国家公共服务领域的城市偏向有日趋严重之势,城乡之间福利差距

^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并不是由于初级产品市场不景气所引起的暂时现象,而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政府失灵的积累。为纠正政府失灵,必须取消包括制约市场机制和扭曲资源配置的进口限制在内的政府管制。(参见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第三版)[M],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不断扩大^[19]。Lipton(1993)^[20]认为,公共支出政策的城市偏向不仅直接增加了农民的医疗与道路建设等费用,而且间接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公共支出的城市偏向提高了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吸引更多的资本、技术和企业进入城市,但这种政策导向所形成的城市集聚不利于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

Lipton 关于公共服务领域城市偏向日趋严重的观点得到了广泛支持。World Bank(2003)^[21]报告显示,在基础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领域,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均落后于城市。Majumdar et al.(2004)^[22]研究认为,尽管大部分人口居住于农村地区,但很多最不发达国家的政府仍然将公共资源向城市部门倾斜。在一个没有阶层游说活动的框架下,假定城乡居民拥有同等发言权,但由于城市阶层获取和利用信息的能力优于农村阶层,进而能够更有力地影响政府选举结果,使得政府有足够的激励将公共资源向城市部门倾斜。此外,Bezemer & Headey(2008)^[23]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如果将农村公共投资看作是促进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村福利的关键因素,那么近三十年来最不发达国家的城市偏向状况持续恶化,这导致城乡居民之间的福利差距不断扩大,并且城市偏向将长期成为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的主要障碍。

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价格扭曲政策随着市场化改革而不断弱化,但公共服务领域的城市偏向却不断强化。Eastwood & Lipton(2000)^[19]指出,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中国公共服务领域的城市偏向上升得尤为迅速。陆铭、陈钊(2011)^[24]相关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与政府实施的带有城市偏向性质的财政、金融等政策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通过户籍制度及其它相关制度安排将城乡居民分割开来,在城乡之间实行两套不同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这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18]。李实、罗楚亮(2007)^[25]研究认为,如果将城乡居民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货币化,那么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扩大近 40%。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城市偏向问题,高彦彦、郑江淮、孙军(2010)^[26]研究指出,在中国民主制度不健全的背景下,城乡阶层均对政府政策缺乏影响力,因此城市偏向理论所阐发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并不完全适用,而中国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并存的政府治理结构,则可能是理解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偏向政策在中国得以延续的重要切入点。

(二) 学术界对于城市偏向理论的批评

在这一阶段,学术界对于城市偏向理论及其新思考提出了诸多批评和质疑,很多批评意见甚至将问题追溯到城市偏向理论的起点,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类批评意见认为,城市偏向理论缺少对发展中国家城市贫困问题的关注。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快速城市化过程,由于城市工业和服务业难以为所有移民提供正式就业岗位,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尽管 Lipton 并不否认城市贫困问题的存在,但他认为农村贫困在规模和强度上都比城市贫困严重。World Bank(2007)^[27]等研究也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现象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学术界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Haddad et al.(1999)^[28]利用世界银行数据研究了 8 个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发现在过去的 15—20 年间,5 个国家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和占总贫困人口的比重均持续上升,7 个国家城市贫困人口占总贫困人口的比重趋于上升。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贫困现象的主要发生区域已从农村转移到城市。Mitlin(2002)^[29]对 23 篇涉及贫困减除战略的论文进行分析,发现这些论文均高度重视农村贫困,但却相对忽视了城市贫困问题。鉴于此,日益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要求人们警惕城市偏向对于城市发展的危害^[2]。

第二类批评意见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乡联系日益密切,城乡界限变得日益模糊。城市偏向理论认

为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严格对立, Lipton(1977)^[11]把城乡人口迁移看得比较消极, 认为农村劳动力是由于城市偏向而被迫进入城镇。城市偏向理论的支持者也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完全基于市场引导的观点持怀疑态度。相关研究对此提出了批评。Estudillo & Otsuka(2010)^[30]等研究认为, 农村劳动力跨越城乡部门的生计策略, 有助于合理安排生产时间和规避农业风险, 并且有助于平滑消费和促进资本积累, 因而对于减除农村贫困具有积极意义。Foster & Rosenzweig(2008)^[31]指出,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是经济发展的标志之一。随着跨越城乡的经济体日益增多, 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 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日益模糊, 在这种情况下, 城市偏向理论将城乡严格区别看待的观点就可能产生误导^[12]。鉴于此, 批评意见认为, 政策制定者应将城乡部门看作一个整体来考虑, 加快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第三类批评意见认为, 城市集聚具有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 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这类批评意见主要来自于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表明, 城市集聚建立在规模经济与市场作用的基础之上, 并且可以产生溢出效应, 这使得大城市的集聚力量存在自我强化作用, 而并不是政府实施城市偏向政策的结果^[32]。由于城市部门生产力水平较高, 并且创造了绝大多数就业岗位, 因此城市集聚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 城市在公共物品供给和使用上具有规模效应, 因此较之于均匀分布而言, 公共服务的城市偏向是对资源的一种有效配置^[33]。经验研究发现, 城市有利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34], 人口密度的提高也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35], 因而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后, 城市的最终规模会不断扩大。World Bank(2008)^[36]指出, 世界上基本不存在城乡或区域之间均衡的经济增长,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 经济活动的集聚和生活水平的趋同可以兼得, 其关键在于提供无空间差别的基本公共服务, 加强地区之间的互动, 实现经济一体化。鉴于此,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 城市偏向理论反对城市优先发展的观点是不明智的^[12]。

四、总结性评论

城市偏向是指政府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实施的一系列偏向于发展城市部门的政策, 城市偏向理论则是学术界对城市偏向政策的理论反思, 旨在倡导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本文对城市偏向理论的提出背景、研究过程及其争论进行了系统评述, 并回顾了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城市偏向问题的研究成果。20世纪60、70年代, Lipton在反思发展中国家城市—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基础上, 从城市偏向视角提供了一个分析第三世界国家城乡关系的理论框架。城市偏向理论认为, 城市偏向政策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村部门的利益, 而且阻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而不公平且无效率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 价格扭曲是城市偏向理论的核心论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 发展中国家的价格扭曲随着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而趋于弱化, 但由于城市阶层持续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使得公共服务领域的城市偏向有增无减, 城乡福利差距不断扩大。鉴于此, 公共服务领域的城市偏向成为城市偏向理论第二阶段研究的核心论题。在城市偏向理论提出之后, 学术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偏向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同时也产生了广泛争论。截至目前,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偏向问题仍未得到完全解决, 对于城市偏向理论的争论也还未完结, 很多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

我们认为, 城市偏向理论侧重于分析发展中国家政治结构的特殊性, 这对于理解城市偏向政策的形成机制可能有失偏颇。此外, 城市偏向理论没有充分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困问题, 并且对于自发形

成的城市集聚缺乏明确解释。但城市偏向理论使得城市偏向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对发展中国家改变城市偏向政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本身就是城市偏向理论的最大贡献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把农业发展和消除城市偏向作为政策目标,对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与消除贫困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现实世界是复杂的,任何理论都有其局限性。无论是城市偏向理论,还是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新经济地理学,都难以为解释现实世界提供所有答案。表面上相互对立的观点其实是有其关联性的,这要求我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应对现有理论进行有效综合。此外,中国城市偏向问题的形成与演进有其特殊性,尽管城市偏向理论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城乡关系演化提供了重要工具,但要全面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偏向问题的延续与固化,学术界仍需进行更多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LIPTON, M. 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 A Study of Urban Bias in World Development[M]. London: Temple Smith, 1977.
- [2] CORBRIDGE, S. and JONES G. A. The Continuing Debate about Urban Bias: The Thesis, Its Critics, Its Influ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Poverty Reduction[R]. Mimeo, prepared for DFID, 2005.
- [3] SCHULTZ, T. W.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 [4] RANIS, G. and FEI, J.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 51(4): 533 – 565.
- [5] HOSELITZ, B. F.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sia[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57, 6 (1): 42 – 54.
- [6] BERRY, A., SABOT, R. H. Unemploy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84, 33(1): 99 – 116.
- [7] LIPTON, M. Strategy for Agriculture: Urban Bias and Rural Planning[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8] BATES, R. H.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The Political Basis of Agricultural Policy[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9] GUGLER, J. Overurbanization Reconsidered[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82, 31(1): 173 – 189.
- [10] 阿马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M]. 王宇, 王文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11] VARSHNEY, A. Self – limited Empowerment: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ural Indi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3, 29(4): 177 – 216.
- [12] ELLIS, F. Agricultural Price Policy in Tanzania[J]. World Development, 1982, (10): 263 – 283.
- [13] 冯海发, 李 澂. 我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数量研究[J]. 经济研究, 1993, (9): 60 – 64.
- [14] LIPTON, M. Urban Bias Revisited[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84, 20(3): 139 – 166.
- [15] CORBRIDGE, S. Urban Bias, Rural Bias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 Appraisal of the Work of Michael Lipton and Terry Byres[R]. in J. Harriss (ed.) Rural Development: Theories of peasant economy and agrarian change. London: Hutchinson, 1982: 94 – 116.
- [16] WEGREN, S. K. Democratization and Urban Bias in Post – communist Russia[J]. Comparative Politics, 2002, 34(4): 457 – 476.
- [17] 林毅夫, 蔡 昉, 李 周. 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9.
- [18] 蔡 昉, 杨 涛. 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 (4): 11 – 22.
- [19] EASTWOOD, R., LIPTON, M. Pro – poor Growth and Pro – growth Poverty Reduction: Meaning,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2000, 18(2): 22 – 58.

- [20]LIPTON, M. Urban Bias: Of Consequences, Classes and Causalit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3, 29(4): 229 – 258.
- [21]WORLD BANK. Rural Poverty Report[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3.
- [22]MAJUMDAR, S., MANI, A. and MUKAND, S. W. Politics, Information and the Urban Bia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4, 75: 137 – 165.
- [23]BEZEMER, D., HEADEY, D.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nd Urban Bias[J]. World Development, 2008, 36(8): 1342 – 1364.
- [24]陆 铭,陈 钊. 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 经济研究, 2004, (6): 21 – 32.
- [25]李 实,罗楚亮.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新估计[J]. 北京大学学报, 2007, (2): 111 – 120.
- [26]高彦彦,郑江淮,孙 军. 从城市偏向到城乡协调发展的政治经济逻辑[J]. 当代经济科学, 2010, (5): 23 – 31.
- [27]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8: Agriculture for Development[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7.
- [28]HADDAD, L., RUEL, M. T. GARRETT, J. L. Are Urban Poverty and Undernutrition Growing? Some Newly Assembled Evidence[J]. World Development, 1999, 27 (11): 1891 – 1904.
- [29]MITLIN, D. Understanding Urban Poverty: What the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s Tell us[R]. IIED Poverty Reduction in Urban Areas Series Working Paper 13, 2002.
- [30]ESTUDILLO J. P., OTSUKA, K. Rural Poverty and Income Dynamics in Southeast Asia[M]. Handbook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ume 4, Chapter 67. Elsevier BV, 2010: 3435 – 3468.
- [31]FOSTER A. D., ROSENZWEIG M. 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ecline of Agricultural Employment[M].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ume 4, Chapter 47. Elsevier B. V, 2008: 3051 – 3083.
- [32]HENDERSON, V. The Urbanisation Proces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So – what Ques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3, (8): 47 – 71.
- [33]OVERMAN, H. G., VENABLES, A. G. Cit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R]. Mimeo, LSE: report for DFID, 2005.
- [34]GLAESER, E., Mare, D. C. Cities and Skills[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1, 19(2): 316 – 342.
- [35]CICCONE, A., HALL, R. Productivity and the Density of Economic Activ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6, 86 (1): 54 – 70.
- [36]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8.

(收稿日期: 2013—03—25 责任编辑: 杨锦英)